

# 近代社会变迁与三次留美热潮

胡素萍

(海南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 海南 海口 571158)

**摘 要:** 鸦片战争后,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出现了三次赴美留学热潮。洋务运动时期, 清政府选派百名幼童赴美留学, 虽中途夭折, 但为我国造就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 20 世纪初, 美国退还庚款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和清华学堂的设立, 引发了中国第二次留美热潮; 国民政府时期, 留美形势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呈现波浪式起伏的特征, 抗战后的赴美洪流成为近代留美运动的最高峰。留美学生对近代中国教育、科技发展、社会的转型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百名幼童; 庚款兴学; 清华学堂; 留美热潮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10(2013)-09-0058-06

经过鸦片战争, 中国闭关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 战争的炮火裹挟着欧风美雨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吹向中国内陆, 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 中国人开始了开眼看世界的历程。怀着追求西方科学和知识的热情, 一批批年轻人负笈到美国求学, 引发了三次赴美留学的热潮。本文探讨的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三次留美热潮, 分析各时期留美学生的特点, 揭示留美学生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 一 举办洋务与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

### (一) 马礼逊学堂开启近代中国学生留美先河

中国人最早的留美活动要追溯到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堂。1839 年, 广州、澳门等地的英美传教士和商人, 为了纪念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华从事的基督教传教事业, 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马礼逊学堂开学之初, 只有 6 名学生, 都是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国平民百姓子弟。进入学堂学习的学生是因为家庭经济原因, 无法像富裕人家的子弟那样通过接受中国传统教育, 博取功名走上仕途, 只好进入马礼逊学堂免费就读。学堂讲授的课程有近代西学知识、汉

语、基督教教义, 由美国人布朗夫妇担任教师。1847 年布朗夫妇因健康原因需要回国修养, 随行带了容闳、黄宽、黄胜 3 名学生赴美留学, 由此, 马礼逊学堂开创了近代中国人留学美国历史的先河。

容闳等抵美后, 布朗先生把他们送进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容闳在孟松学校毕业后, 入读美国耶鲁大学, 成为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学生。1854 年容闳完成耶鲁大学学业, 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

### (二) 百名幼童赴美留学

容闳回国后, 相比美国的繁荣发达, 中国的贫穷落后使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理想, 他立志要促成更多的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 于是开始酝酿一个西学东渐培养人才的计划。他设想, 如果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像他一样, 接受美国的教育, 回国以后对中国进行改造, 就会使中国变成美国式的发达国家。于是容闳呼吁清政府派出学生到美国留学, 为实现其教育计划不懈努力。

19 世纪 70 年代, 中国开始了以“自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 请政府开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 机器生产开始在中国大地出现了。但是机器生产需要掌握技术的人来操纵, 洋务

收稿日期: 2013-06-04

作者简介: 胡素萍(1965-), 女, 湖南常宁人,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中美关系史、中国近代史。

派开始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正在此时,容闳的留美教育建议呈报到曾国藩、李鸿章的手中并得到重视,其主要内容是: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 120 名学额以试行之。此 120 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 30 人。留学期限定为 15 年。学生年龄,须以 12 岁至 14 岁为度。<sup>[1]</sup>

1871 年 6 月,曾、李联名上奏,拟派员设局挑选幼童赴美肄业徐图自强,1872 年 5 月,请政府批准了留学计划,由容闳等人负责具体实施。但是,清政府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进展颇不顺利。在第一次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时代,人们普遍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致使选拔工作一开始就遇到重重困难。1871 年,第一批 30 人在上海招考时,因凑不够名额,容闳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广东香山县做动员工作,终于凑够人数,按规定的时间和计划在 1872 年派出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封建传统观念作怪:一是中国人乡土观念重,一般人不愿意自己的子弟长时间离乡背井,去往茫茫异乡;二是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和西方文化的了解极其有限,民间对世界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有恐惧心理;三是传统的价值观和仕途观念使当时的士大夫不屑于出国留学这一途径,士子梦寐以求的是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所以,对文人士大夫而言,出国留学并没有吸引力。

在容闳等人的努力下,120 名幼童终于分四批赴美,为我国近代公费留学之始。首批留美学生有三个特点:一是大多数来自中下层之家;二是留学生大多来自广东、江苏、浙江 3 个沿海省份,这是因为广东人有出外谋生的传统,而且广东也是得风气之先、西学东渐最早的地区。三是从年龄上说尚未成年,最小的 10 岁,最大的 16 岁,正是少年时期。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乃是“古今未有之事”,这一破天荒的举措,是中国应洋务运动之需而向世界迈出的重要一步。

### (三) 留美幼童提前回国

留美幼童在美国学习并不顺利,主要是在幼童赴美留学事务中,负责监督学生在美国学习的陈兰彬和容闳经常因为意见不一而产生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兼学“中学”问题。出洋前,清政府规定,幼童在学习西学的同时兼学中学,以免忘本。为了使学童不偏离儒家正统,使之接受

中国道德观念,学童每天要先拜孔子后才上学。久而久之,学童对这些仪式越来越不感兴趣,这是保守的留学监督陈兰彬不能容忍的。二是服装、辫子问题。幼童出国时,一律身着长袍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到了美国,这种着装和发式经常引起人们围观,使他们很不自在。在运动场上,摇晃不定的辫子又引来不少笑声。后来,幼童们纷纷要求入乡随俗,穿西服,剪辫子。留美学生的这些变化,对容闳来说不以为怪,而且还经常袒护幼童。陈兰彬和容闳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观、不同留学目的以及不同教育方法的矛盾。容闳的态度遭到留学事务局的严厉指责,他们上奏朝廷说留学教育利少弊多,主张撤回留美学生。在第一批留美学生出国近十年的时候,国内出现一股质疑出洋肄业的风潮。总理衙门也逐渐相信留学生“见异思迁,洋化极深”,加之美国排华风潮日盛,便上奏将学生全部撤回。1881 年 6 月 8 日,慈禧太后下谕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尽管容闳极力想挽救要毁于一旦的留学教育事业,但这些努力终归徒劳,从 1881 年开始,留美学生分三批陆续撤回国内。

尽管清政府撤回留美学生的错误决策影响了中国的留学教育,留美计划没有完全实现,但早期留美学生的派遣为我国培养了一代新人,造就了与旧式封建文人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回国后的留学生大多被分派到船政、机器、铁路、电报、矿业等新兴领域,成为我国近代工业和技术方面的第一批专家,出现不少事业的奠基人。詹天佑从耶鲁大学铁路工程专业毕业,回国后自行设计、勘察,建造了京张铁路,成为世界闻名的铁路工程师。留美学生中还有一些人成为外交界、政界的风云人物,如梁诚,幼童撤回时,他还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后来他赴美公干,入读耶鲁大学并完成大学学业。他曾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德国等国公使,在外交事务中维护国体尊严,树立了新一代外交官的形象。分配到海军部门的留学生,为抵抗列强的侵略,保卫海防竭尽全力。如在中法战役和中日黄海海战中,都有留美学生英勇奋战,为国捐躯。总之,随着留美学生回国后在各行各业中的作为,这一学生群体的表现获得舆论的高度赞扬,逐渐为社会各界所承认。

1872 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生,开启近代留学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以此为开端,留学教育继往开来,激发了成千上万学子的留学热情,两年后,中国陆续向法国、德国、日本派送留学生。

## 二 退还庚款与第二次留美热潮

### (一) 退款兴学之议

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与11个国家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也称《庚子赔款》。条约规定中国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美国从中分得约3千3百万两。这个数额,就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也承认比美国实际的损失“实属过多”。驻美公使梁诚得知美国的态度,便与美国交涉退还超出部分的庚款。在他的一再要求下,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的议案,声明将退款用于资送学生赴美并在北京开设一所留美预备学校。

美国提出将退还的庚款资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是因为美国人意识到,对待中国,除了政治、经济渗透外,还要特别注意实行文化渗透,培养亲美人才,以便在将来控制中国知识界,使之成为美国操纵中国的势力。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在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中认为,当时大批中国学生赴日本和欧洲留学,中国未来将会仿效欧洲、日本,而不是美国。所以他建议总统将退还中国的钱用于增加中国留学生,以便从智识上与精神上影响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控制中国发展。由此可见,美国的“退款兴学”是作为一项长远的对华战略提出来的,是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其真正的目的是以美国自身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加强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梁诚早就有把退还的庚款用于兴学育才的想法,尽管与美国退款兴学的动机不同,但双方在款项的用途问题上达成一致。

### (二) 留美预备学校

1909年,美国政府正式退款。从这一年开始,清政府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和派遣了三批直接留美学生共280名,清一色是男生,这是继百名幼童之后中国又一次大规模派遣留美学生的开始。与此同时,1911年设立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改名“清华学校”),目的是培养留美预备生,这样,派遣留美学生的工作便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被派往美国的留学生称为“庚款留学生”。清政府建立了专门机构——游美学务部,负责考选学生、遣送学生、驻美管理监督等事务。

由于在短时间内精选留美学生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光留学考试就非常严格,不仅考试的科目多,涉及的知识面广,而且除国文外,各科都要用英语回答,在当时外语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最初3

年都无法按时完成录取人数。为了克服选派留学生的困难,使学生出国前在学业、思想甚至心理上都有所准备,清政府把相当的精力放在留美预备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上。清华学校的全部经费由退还的庚款中支出,其办学的目的是:先在国内招考学生,经过训练,“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清华学校既然是为留美作准备的学校,其办学方针一切都是仿效美国,从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法、体育以及各种课外活动几乎全部照搬美国学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学生熟悉美国的风尚,尤其是希望从清华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派往美国,很快就能适应美国的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课程都是为了将来留学美国而特别设置的,特别是英文课程的训练系统严格,是学校的主要课程,每周时数最多,一天约有五六小时专攻英语。经过训练,学生的英语基础扎实、准确全面。学校营造了英语文化氛围,英语取代汉语,教师上课和与学生交谈也用英语,就像是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

清华学校建立后,成为我国派遣公费留学生的一条重要渠道,每年的高等科毕业生都全部资送留美,此外还有一些留美的自费生也接受清华的一部分津贴,称津贴生。从1911年到1929年,经清华派出的公费留美学生共1279人,津贴生475人。<sup>[2]</sup>从清华学校可以看出国人对出国留学的态度与幼童赴美时的情况大相径庭,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中学和西学的态度变化。比如,清华学校的汉语科目不多,全部安排在下午上课,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午休,上课时非常疲乏,与上午的情况截然不同。此外,汉语课教学方法单一,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只是教师的原因,实际上反映出辛亥革命以后社会风气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过去人们不屑于读洋学堂,更谈不上出洋留学,现在,过去“不屑”的事变得时髦了。20世纪初,科举制度除以后,出洋留学成了诱人的事,是很多父兄对子弟的期望,也是青年学子的追求,因而,学生们跟着风气走,学英语的自觉性很高,对那些到了美国用得上的课程表现得异常积极。相比之下,汉语课程就有点应付性质了。清华学校是留美预备学校,重洋轻中的现象最为突出,集中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典型心态。

### (三) 庚款留美学生的特点

由于庚款学生的派遣,使中国留美学生迅速增加,再次掀起了留美高潮。庚款学生与一般留学生

一样都有振兴中华的抱负,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是他们又与一般留美学生有所不同。

第一,庚款学生适应性强。大部分学生在清华大学期间,在学习上甚至生活方式上全都效仿美国,经过从表到里的“美国化”的过程,为毕业后赴美做了相当系统而充分的准备,当他们踏上美国的土地,很快就能适应新环境的生活和学习。

第二,庚款学生经费有保障,能集中精力学习,无后顾之忧。他们自中国赴美国的旅费、手续费等都由学校支付,在美国的生活费由游美监督处按月发放,实验费、手续费也都由监督处直接支付,回国发给旅费,所以他们在美国过得很宽裕,生活比较安定,可以专心致志学习。

第三,庚款学生在美国期间攻读自然科学的占了多数,所学的科目以理、工、农、医为主,大概占62.7%,学文、史、哲、政法的占33.6%。形成这种情况固然与中国政府派留美学生的意图有关,同时也与留美学生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密不可分。

在20世纪初由于庚款留学生的派遣,使留美的公费生增多,形成了第二次留美高潮。除了经清华派出的官费留美学生和津贴生,还有其他渠道赴美留学,如教育部直接遣送、各省公派、教会学校资助以及自费留学等。留美学生派遣的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在我国近代留学史上是少有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发展。

### 三 动荡之秋与大起大落的留美潮

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选派赴美留学生改为在全国公开招考。以1928年为界,北洋政府时期的留美教育呈现平稳发展的态势,国民政府时期的留美则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体现出大起大落的波浪形发展特征,元青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1929—1932年,留美人数大幅度下降。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经济不景气导致留美学生人数锐减。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整顿留学制度,提高留学资格,限制了一部分有志留学而资格不够的青年学子。此外,1928年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后停止庚款留美,也是这一时期留美人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②1933—1937年,留美人数有所回升。经济危机结束后,中国学生开始重新把目光瞄准美国。伴随全国各项事业的兴起,中国留学教育也开始走上

正轨,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各种形式的留美应运而生。1933—1936年清华大学举办四届留美公费考试,共派出92人赴美留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钱学森、张光斗等人。各地也纷纷举行留学生考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留美人数开始回升,1937年在美国大专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达到1733人。

③1938—1945年,留美人数处于低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海外学子纷纷辍学回国,共赴国难。南京政府为了节约外汇以应战时需要,颁布了限制留学的办法,大大限制了学生出国。1938—1941年,赴美留学人数总共只有193人,清华只举办了一届留美公费考试。

④1946—1949年,抗战胜利后再现留美热潮。由于二战中中美结盟,战后美蒋关系密切,美国向中国提供各种奖学金,鼓励中国学生前往美国学习、进修。南京国民政府为战后重建,重新制订《留学教育方案》,选派大批青年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赴美。1948年后,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军事上节节败退,很多人愤于时局或对前途感到渺茫,纷纷自备外汇涌入美国。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几年,留美人数暴增,汇成了一股强大的赴美洪流,1949年中国留美学生达到3797人,成为近代留美运动的最高峰。<sup>[4]</sup>

国民政府时期留美学生有着鲜明的特点:第一,留美学生所学专业总体上文理持平。但在公费留美学生中,学理工者明显居多,在高学历的留美生中,学理工的也远远多于学文科;第二,无论公费还是自费,留美学生在国内所受的教育程度都比较高。留美学生大多来自国内高校,如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等。学生赴美后进入的学校大都是美国较好的学校;第三,留美学生不仅学业出类拔萃,而且满怀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完成学业后大都回到国内。新中国成立前后,留学生掀起回国参加建设的热潮,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赵忠尧等大批科学家冲破美国的重重阻力回到国内,为祖国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抗战后赴美留学的人员,由于战争的磨练,对前途的看法大多较为现实,对问题的思考从理想化转为现实化,他们学成后,归国者少,滞留海外者多,这也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和留学思想的变迁。

### 四 留美学生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 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

留美学生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成长于近代中国新旧教育的转型时期,往往幼年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青少年时期逐渐接受新式教育,最后赴美直接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在美国,“他们亲身接触到一个广阔的新世界,才对中国落后状态有真切的认识,并怀着极大的热情理解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并与中国相比较,这样,那几千年来来的封建体制和儒学道统在他们眼前彻底动摇了,开始崩溃了。”<sup>[74]</sup>与最初“开眼看世界”的先辈不同的是,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他们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者。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就与留美学生的活动有密切的联系。首先,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与汉字拼音和拉丁化问题,是在1911年留美学生成立的“文化科学研究所”上展开热烈讨论然后传到国内的。<sup>[74]</sup>

其次,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和科学,在当时所指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样板的,首先也是在留美学生中提出来的。

(二) 促进中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大学教育的发展

从清末至民国,在百年间的数万名留美学生中,产生了像胡适、王世杰、罗家伦、梅贻琦等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影响深远,而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教育。据统计,到1925年,清华大学留美归国的学生约有620人,其中到教育界供职的占33.78%,居其它职业之最多数。<sup>[70]</sup>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中,教育界名人有1103人,有国外留学出身者904人,在这些留学出身者当中,留美学生最多,占了51%。<sup>[7]</sup>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进入高等院校从事教育和担任教育管理工作,成为近代大学师资的主要来源,一些人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留美学生还是美国教育制度东渐的主要媒介,他们带回的新思想、新方法,促进了大学教育内容的更新,对中国教育体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起了推动作用。

(三) 在中美文化交流中承担中介角色

中西结合的教育经历使留美学生对中外文明有较深切的理解和体验,他们既能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又感叹西方现代科学的进步,同时意识到取长补短、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我所用的重要性,因而能在中美文化的交流中承担起中介角色。早期的留美学生蔡廷干用英文著《唐诗音韵》,1930

年在美国出版后,增进了美国人民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解,他在晚年撰写研究老子的著作《老解老》,在美国也有一定的影响。邝其照编撰《英文成语词典》,1881年在纽约出版后,至今仍为美国学者所参考。

当然,在近代中国新旧转型走向世界的时候,留美学生更重要的是担当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力。以教育为例,如前所述,近代中国高等学校的发展与归国留美学生的努力分不开,他们不仅构成高等学校管理者和师资队伍的主体,而且还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教育思想,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原就读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胡适敬仰杜威的学问和人格,成为杜威的学生。1915年他和蒋梦麟等一批杜威的学生筹集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杜威在中国停留了两年零两个月,进行了无数次的演讲,主要介绍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在高等学校和学术界引起极大的轰动。这些演讲由胡适等人翻译,后来通过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介广泛介绍和宣传,在中国教育界掀起一场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热潮。胡适曾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sup>[7]</sup>胡适还将杜威的平民教育思想介绍到国内,顺应了中国知识界“教育救国”的需要,在胡适、晏阳初等一批留美学生的倡导和参与下,在20年代,逐渐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颇具影响的平民教育运动。在学制改革问题上,留美学生积极介绍和引进美国的“六三三”学制,经过一番舆论攻势,1922年底教育部采纳留美学生的意见,定中学学制为“三三”,即初中、高中各3年。1922年11月,新学制正式公布,是为“六三三四制”,即小学6年,初中、高中各3年,大学4年,这是美国学制对中国影响的具体表现。<sup>[7]</sup><sup>[129]</sup>此外,留美学生在引进和借鉴西方近代教育研究方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法方面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 留美学生成为中国现代科学领域的奠基人

从清末到民国,留美学生在美国期间所学的科目以理、工、农、医为主,他们认识到,美国繁荣昌盛的关键在于科学发达,因此普遍抱有“科学救国”的理想。在美国期间,他们学习认真严谨,苦心钻研,有志于他日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五四”以后,由西方输入的各种新学科开始在中国生根成长,这些新学科在中国的创始人和带头人都是留学生,其中留美学生占了多数。如,竺可桢是中国第一个从事

近代气象学研究的学者,在他的主持下,全国各地设立了四十多个气象站,使中国的气象事业初具雏形;茅以升回国后,于1933年主持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第一个用现代技术修建桥梁的桥梁学家;侯德榜努力探索新的制碱法,大幅度提高了纯碱的产量,在国际化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使中国的化工技术一跃而登上世界舞台。

在国人对科学的认识逐步深化的基础上,留美学生们还为在国内建立专门的研究所而努力。1915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是留学生创立的非官方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机关,1922年在南京办起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则是留学生致力于在国内按学科专业分门别类建立专门研究所的结果,从此,生物开始成为中国的一门独立的学科。1928年,近代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官办科研机构——中央研究

院成立,内设地质、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学、动物、植物、数学、医学、心理、社会、历史语言等13个研究所。1948年,该院从全国学术卓越的杰出人士中选出年81名院士,多数是归国留学生,其中美国留学生有49人,占总数的60%。<sup>[8]</sup>可见,留美学生对我国科学事业所做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总之,留美学生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随着早期留美学生的归国,这些学到先进知识的莘莘学子也有了比前辈更多的用武之地,逐渐走向社会中心,成为当时教育界、工程界、金融界、商业界以及一些新兴行业的新鲜血液,对近代中国教育、科技和社会的转型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3.
- [2]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 清华大学校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81:7-13.
- [3]元青. 民国时期的留美学生与中美文化交流[J]. 南开学报, 2000(5): 63-64.
- [4]罗荣渠. 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J]. 近代史研究, 1986(2).
- [5]佚名. 当代中国之名人调查研究[J]. 民族杂志, 1935,03(2).
- [6]葛懋春,等.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181.
- [7]梁碧莹. 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129.
- [8]樊洪业. 前中央研究院的创立及其首届院士选举[J]. 近代史研究, 1990(3): 218-230.

(责任编辑:李莉)

## Social Changes and the Great Upsurge of Studying in USA in Modern China

HU su-pi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HNU,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Abstract:** Modern China has witnessed three upsurges of students studying in USA along with social changes since the Opium War. During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Qing Regime selected and dispatched one hundred children to study in USA, which had trained a batch of new-type intellectuals despite the failure of the program halfway.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eturn of indemnity by USA for subsidizing Chinese students' studies in US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singhua School resulted in the second upsurge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in modern China.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udying in USA underwent ups and downs in line with situation vari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while the upsurge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USA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ecame the summit of studying in USA in modern China. Students studying in USA have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a's educatio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ocial transition as well as on Sino-US cultural exchanges.

**Key words:** one hundred children; the return of indemn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s; the upsurge of studying in USA